

乡村化城市: 20 世纪 30 年代前期 游人眼中的曲阜

吕厚轩

内容提要: 20 世纪 30 年代前期, 中国的旅游业得到初步发展, 津浦铁路沿线的社会秩序相对安定。作为历史文化名城, 曲阜遂成为旅行社重点推荐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多数游客, 抱着对孔子的敬意及对其后裔的好奇心抵达曲阜参观游览。但曲阜落后的交通、寥落的景点、衰败的社会经济和保守的社会风俗, 让多数游客对曲阜城这个“乡村化城市”略感失望。游客们虽能肯定孔子及其历史地位, 但已失去帝制时代的温情与敬意。在进步与革新思潮的影响下, 孔子及其后裔在当时已成为一个文化符号, 曲阜也成为古老与落后的象征。

关键词: 乡村化城市 20 世纪 30 年代 旅游业 曲阜

20 世纪 30 年代前期, 津浦路沿线的政治环境相对安定, 国内旅游业得到初步发展。^① 曲阜虽小, 但因是孔子故里, 是“东方圣城”、中国的“耶路撒冷”, 所以与津浦路沿线的济南、泰安等城市一样, 作为历史文化名城, 成为旅行社重点推荐的旅游目的地。^② 当时, 随着团体旅游的兴起, 公务员、教师、学生等成为旅游的新主体, 以消遣为目的的旅游渐成风

① “以抗战为界, 民国旅游明显地分为战前、战中和战后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末期即 30 年代中叶是高峰期, 旅游呈现一派蓬勃气象。”参见贾鸿雁《略论民国时期旅游的近代化》,《社会科学家》2002 年第 2 期。因此, 本文选择 20 世纪 30 年代这一时期的游记作为研究对象。

② 在同时期的《申报》与《旅行杂志》上, 经常可看到关于曲阜游的广告, 如: 京沪铁路和津浦铁路联合举行“万德泰山孔林滁州”大规模的全费旅行, 上海、南京两地, 都可报名加入, “八月二十四日上午八时上海出发, 下午五时换津浦专车北行, 二十五日上午

气，这些旅游者多是来自大城市、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社会精英。他们留下了数量可观的游记，为后人研究、了解当时曲阜的社会风貌提供了独特而又丰富的资料。本文即拟以这些游记为基础，呈现他者眼中的“圣城”。通过游客的观察，勾勒曲阜城社会生活的基本风貌，以期在城市社会观察史方面进行一些探索，尚祈学界同好教正。

一 艰难的进城之路

民国时期，曲阜的交通较为落后。名义上，津浦铁路设有一站，曰曲阜站，可该站并不靠近曲阜城，而是设在曲阜城北18里处的姚村。曲阜城之所以闻名中外，是因为孔子，而曲阜站之所以远离曲阜城，也与孔子有关。“闻津浦铁道方兴工时，本拟近城筑站，而衍圣公不许，必使距离孔林绝远方可，故今站筑于此。”^① 末代衍圣公孔德成的姐姐孔德懋的回忆亦证明此说不虚。“我父亲在世时，光绪三十年（一九〇四年），勘测津浦铁路，原计划从歇马亭向南经过曲阜离孔林的西墙很近，听说当时我父亲非常着急，向朝廷连递几件呈文，说铁路将‘震动圣墓’，‘破坏圣脉’，祖宗的灵魂不得安宁等，最后终使铁路绕道，拐个大弯，逶迤向南。”^② 曲阜站尽管远离曲阜城，但其影响力不可小觑，“虽是很小的一站，却无论特别快车，普通快车，都得在此停留几分钟，大约是对孔老夫子表示敬意”^③。因曲阜站离城较远，多数游客在姚村下车后，不得不重新选择其他交通工具赴城内游览。经济上并不宽裕的人，一般选择步行进城；对于经济相对宽裕的游客，有三种方式可供选择：一是乘“土牛子”，二是骑驴，三是乘骡车。

“土牛子”是指一个人推的独轮车。这种独轮车，多用于山区载运货物，偶尔也用来载人。由于路途颠簸，人与行李共乘一车，给车夫带来极

七时抵万德，下午游灵岩寺，下午开泰安。二十六日全日游泰山。二十七日晨抵濮阳（即兖州）换乘汽车至曲阜参加祭孔大典，并游颜庙、孔林。二十八日晨抵滁州，游醉翁亭、琅邪山、丰乐亭”。见程志政《万德泰山曲阜滁州记游》，《旅行杂志》第10卷第10号，1936年。

① 蒋维乔《曲阜游记》，《小说月报》第6卷第12号，1916年。

② 孔德懋《孔府内宅轶事——孔子后裔的回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第44~45页。

③ 洪为法《曲阜漫话》，《为法小品集》，北新书局，1936，第1页。

大的困难，让坐车者往往心有不忍。旅行家倪锡英与朋友坐“土牛子”进城时，看着满头大汗的车夫，“‘太可怜了！……’”，我们想。这时我们就开始和车夫谈论各种事情，这样或许能把他的疲倦忘了一些。有时我们看得他们太累了，就下车走走，让他们能休息一会”^①。独轮车的不便给游客留下了深刻印象，骑驴进城则是另一种特别的经历。骑驴进城看似简单有趣，事实并非如此。“由曲阜站至孔庙，相隔约二十余里，时适在雨后，道路泥泞，步行不易。公决乘驴，以调和舟车之苦；孰知驴性不驯，又不善御，至中途花样百出，颜、郭二君竟被其摔下，颇堪发噱。”^②“土牛子”让乘车人心里不舒服，骑驴又不安全，于是，骡车（或驴车）成为大多数游人进城的选择。

但乘骡车也未能减少游人的痛苦，因“孔林距车站十八里，皆泥途也。凹凸不平，驴车过之，震荡酸骨”^③。更让游人难以忍受的是，骡车的速度太慢，“十八里路要走三点钟左右，看来比牛还慢。反正慢走已经够颠簸了，快更受不了。所以我坐在骡车上的时候，为怕脑袋被碰坏，为怕五脏被翻转出来，倒希望它慢慢的走，慢到不能再慢。其实也可下车走走，但是路上风沙太大，与其被风沙欺负，倒不如像刺猬一样的缩在车厢里任其颠簸”^④。

乘津浦路列车赴曲阜的游人，也可从兖州站下车，再乘车到曲阜，但这条路的路况同样糟糕。“从兖州到曲阜，计程二十里，虽然不远，可是羊肠鸟道，崎岖不平，坐在街车里面，颠颠倒倒，感觉无上痛苦！那特别火烧似的太阳，正对着我们的全身，老于奔命的车夫，一身身的热汗，从背上珠子般的流下，我呢，全身也发苦热！”^⑤坐人力车让游人痛苦不堪，乘坐汽车亦无舒适之感。1935年时，兖州到曲阜已通汽车，“我们登谒圣汽车，车是向山东省公路局租用的，共三辆，每辆只可容纳二十人，车顶很矮，站着的人，无法可以直立，必须伛偻，车行凡四十分钟，路途不平，车行又速，颠簸得十分厉害，站着的人固然苦不可言，坐着的人，也

① 倪锡英 《曲阜泰安游记·曲阜之部》，中华书局，1931，第17页。

② 怀僧 《游曲阜漫录》，《华年》第1卷第25期，1932年。

③ 韦润珊 《曲阜记游》，《史地学报》第2期，1923年。

④ 洪为法 《曲阜漫话》，《为法小品集》，第2页。

⑤ 晶洁 《曲阜一日》，《民间旬刊》第36期，1931年。

觉五脏翻覆，啼笑皆非”^①。糟糕的交通状况，给这些来自大城市的游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二 寥落的旅游景点

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曲阜可供游览的景点自然不在少数。孔庙、孔林、颜庙、陋巷、周公庙、少昊陵、舞雩台、尼山等地，均有诸多故事可讲。可当时游人到曲阜，游览的景点多集中在两孔——孔庙和孔林，颜庙和陋巷因与孔庙相隔不远，常成为游人顺便光顾的景点。孔府当时还是衍圣公的私人府邸，一般不接待游人，而周公庙、尼山和少昊陵等景点，因在城外，距离较远，在交通不便的状况下，鲜有游人光顾。

到曲阜旅游，孔庙自然是首选。孔庙在县城正中，南大门与县城南门相连，“据说那正路的门是不轻易去开，非得皇帝驾到办不到，而且还得将城墙捣个窟窿，因为皇帝是不和凡人走同一城门的”^②。一般游客多从孔庙东边的毓粹门进庙游览，沿中轴线参观。向北经大成门，过杏坛，抵达核心区域——大成殿。大成殿后是寝殿，再后为圣迹殿，殿中列有吴道子画的孔像刻石，壁上镶着孔子周游列国的故事图刻石。大成殿西，为启圣公庙，庙前为金丝堂三间；大成殿东，为家庙五间，家庙前有诗礼堂、鲁壁、孔宅故井等景点。孔庙中，让游人流连忘返的是那参天的古柏，最吸引眼球的是大成殿石柱上的雕龙。“十个抱可数围的青石柱，就石镌雕盘龙，工极雅细！这种工程，我相信是帝制下唯一的出品，虽然科学倡[昌]明的现在，这种人工产物，绝不是机械可以造成的。”^③据说以前皇帝到孔庙时，衍圣公会让人用红布把石柱包裹起来，担心皇帝看见心生忌妒。1930年中原大战时，阎锡山的军队炮轰曲阜，有炮弹落到孔庙，对古建筑造成了巨大伤害，在当时引发了不小的轰动。战后，国民政府曾发出

① 程志政 《万德泰山曲阜滁州记游》，《旅行杂志》第10卷第10号，1936年。

② 孟粹夫 《曲阜记游》，《中学生文艺季刊》第1卷第1期，1935年。此说不确，据孔德懋的回忆，“正南门是正对孔庙的曲阜城门，平时关闭，只有皇帝出巡或祭孔时才能打开。民国后德国公使来曲阜参观也曾开过一次，除此以外就是小弟出生这一次了”。参见孔德懋 《孔府内宅轶事——孔子后裔的回忆》，第56页。

③ 晶洁 《曲阜一日》，《民间旬刊》第36期，1931年。

倡议，号召各界捐款重修孔庙。^①但修缮工作进展缓慢。1935年祭孔大典时，“大成殿两檐已歪，屋顶上满生杂树，也无人删除，长此以往，势将倾圮。希望政府贯彻尊孔主张，早日拨款兴修，以维圣迹”^②。

出孔庙向东北行不远，即为复圣殿，又称颜庙，庙旁为颜回所居之陋巷。“颜庙比起孔庙来，规模要小得多，也残破得很，大概也有许多年代没有修理。大殿的顶上，已露着蓝天，颜子像也能晒晒太阳了。它给予人的印象，不如孔庙那样的庄严，伟大，富丽，堂皇。它只是令人觉到它的残破，衰落，不景气；在几千年之后的今日，孔子与颜渊的地位，仍有这样大的分别的感想来。”^③军阀混战时期的战火痕迹在这里依然明显，“庙门已被内战之炮火轰毁，现用一根小柱撑持，恐力不足以长支此大厦。院内草深没膝，树木颠倒，凄凉满目，与孔庙竟有天壤之别。有大殿一幢，中供颜回神像。像为一白面书生，双手作拱状，此外一无他物……说者谓：颜回居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今此殿之不修复，正足以完成颜回之夙愿，又何必为颜回叫屈”^④游客的这种心理，不知是理解颜回还是可怜颜回。

从颜庙向北，出北门二里许，即达曲阜另一重要景点——孔林。“孔林离城约二三里，背泗面洙，门外为洙水桥。自此绕以墙垣，周围约四十余里。林门前有大石坊，上镌万古长春四字。左右守林人，聚族而居，皆孔姓也。”^⑤与孔庙里各色宏伟的建筑相比，孔林则相对简单，“孔墓极简单，除碑石和香炉外，别无他物。以之与中山墓相比，富丽不足，朴素则过之”^⑥。但孔林里种类繁多的古树给游人的印象颇为深刻，“尤其是千年老树，森森松柏，到曲阜的人，没有一个不想一玩，虽然中山陵的宏大，

① 1932年，国民政府内政部即通过戴季陶等人的提案，向社会各界募捐，重修孔庙。参见《南京市政府公报》第115期，1932年。

② 程志政《万德泰山曲阜滁州记游》，《旅行杂志》第10卷第10号，1936年。

③ 王洪涛《曲阜的踪迹》，《青年月刊》第3卷第5期，1937年。

④ 怀僧《游曲阜漫录》，《华年》第1卷第25期，1932年。1931年5月，国民政府即启动孔庙修复计划，号召社会各界捐款，但响应者寥寥。1934年，鲁省主席韩复榘以修孔庙耗资巨大、募款不足为由，提出先修颜庙，颜庙因此得以修复。《申报》1934年1月28日。

⑤ 蒋维乔《曲阜记游》，《因是子游记》，商务印书馆，1935，第270页。

⑥ 怀僧《游曲阜漫录》，《华年》第1卷第25期，1932年。

明孝陵的幽深，可是都没有孔林的完善”^①。

20世纪30年代前后，中国旅游业刚刚起步，且多为民间组织和团体推动，政府尚未把旅游看成一种产业，更遑论开发。因此，到曲阜的游人，并不需要购票，也没有专业导游，一般都是由看庙人领着参观，并提供讲解。这些看庙人并不需要固定的费用，讲解完毕后，只要给点小费即可。由于曲阜当地经济水平低，看庙人很容易满足，“出庙时给了看庙的人六角钱，他似乎很满意的接着”^②。虽然也有游客对此表示不解，“我们乍一知道，觉着很稀奇，又很气愤。他们这些看守者，竟以孔庙孔林作为讨钱的工具了，也未免太不近情理”，可游览结束后，印象则大有改观，“可是他们却不计较酒钱的多少。给他们几角钱，他们当然是很喜欢；就是给他们几分钱，却也不再争执。同时他们对于游人也有许多好处：这些‘先师手植桧’、‘唐槐’、‘宋杏’、‘子贡手植楷’、‘子思墓’、‘伯鱼墓’等。若不是有他们说，我们哪能知道呢”^③。至于旅游产品，更是少得可怜。“游后，因曲阜非如苏杭各处，有土产可买，只好徒手归旅馆，又徒手的离开曲阜。”^④但也有细心的游人发现了一些带有地方特色的东西，“没有什么可买。街上叫喊的小贩，常戴的那种大草帽子，倒很不错，大得像个伞。我在东关集上买了一个草帽子和两个薺(?)草的蓑衣。街上的碑帖铺也很多，这似乎是曲阜的特产。有人说街上所卖的字帖都是假的，没有石拓的本子，惟有孔庙里的才是真的。于是我又跑到孔庙里买了几张字帖，和孔庙、孔林图各一张”^⑤。由此可见，当时曲阜本地人并没有看到旅游带来的商机，亦未出现专门从事相关服务的人员。

三 神秘的孔府与衍圣公

到曲阜的游人，除参观游览孔庙、孔林等景点外，最能勾起他们兴致的莫过于颇有神秘色彩的孔府及住在孔府里的衍圣公了。因此，凡到曲阜

① 晶洁 《曲阜一日》，《民间旬刊》第36期，1931年。

② 凌叔华 《泰山曲阜记游》，《国闻周报》第11卷第41期，1934年。

③ 王洪涛 《曲阜的踪迹》，《青年月刊》第3卷第5期，1937年。

④ 汤之盘 《曲阜游记》，《人文月刊》第1期，1944年。

⑤ 王洪涛 《曲阜的踪迹》，《青年月刊》第3卷第5期，1937年。

的游人，无不想一睹孔府及衍圣公的风采。

由于孔府当时是衍圣公的私宅，进去参观不太可能，但孔府前院的办公区可以游览。一般来说，只要是游人特别是旅游团体向孔府的门房提出申请，大多能得偿所愿。据孔德懋回忆：当时到曲阜的国内外游客，“外宾也很多，有的外宾来以前由孔祥熙或国民党政府打招呼的，也要隆重接待，到兖州迎接”；而对于一般的国内旅行团体，则相对简单，“也有群众团体来访的，如：北大旅行团，齐大旅行团，来孔府后都要求见见‘小圣人’，小弟只在外面客厅见几分钟，照张像”^①。

30年代初的衍圣公孔德成，虽还年幼，但孔府中关于他的神秘传说已有很多。“如同历代衍圣公一样，自然还有不少关于小弟不同凡人的传说，比如说某扇门上有条巨蛇趴在那里，多少人来关门都无法推动，后来有个当差的爬上去看，当时就吓昏过去，而门仍无法关闭，恰巧小弟走来，那时他刚几岁，他刚走到门口，那蛇立即逃跑了。如此等等，举不胜举。说的许多事情，常常连他自己也不知道。”^②可在一般游人眼中，衍圣公与常人并无不同。“你们一定想知道一个清清楚楚的衍圣公的样子是怎样的吧！他今年是十三岁，他已经长得很高大了，他有一幅白白胖胖的脸，一对温柔的眼睛，一堆乌黑的头发，头发是剪的平顶式的，身上穿着一件纺绸单衫。一双白的袜黑的缎鞋，穿在他的脚上。手里摇着一把大折扇，看上去真是一个安静的小孩子。”^③只不过，与一般家庭孩子不同的是，在儒家教育的熏陶下，貌似孩子的衍圣公在公众场合已表现得相当成熟。“大家等了好久，很心焦，总算有缘，一个神气十足的男子，带了一个十二岁的小孩，彬彬有礼进门，大家知道这就是小孔来了，诗礼之家，当以礼待之，因此都站来，一个招呼，分别坐下。”^④作为衍圣公，自然需要有超出常人的成熟，“十几岁的小儿，本可跳跳跃跃，活泼泼的，无如他是衍圣公，便不能不少年老成，规规矩矩，规矩到使人说‘这小孩子简直不像十几岁。’”^⑤但作为孩子，其童真的天性很难泯灭，回到后花园，他依然喜欢

① 孔德懋 《孔府内宅轶事——孔子后裔的回忆》，第145页。

② 孔德懋 《孔府内宅轶事——孔子后裔的回忆》，第80页。

③ 倪锡英 《曲阜泰安游记·曲阜之部》，第47~48页。

④ 晶洁 《曲阜一日》，《民间旬刊》第36期，1931年。

⑤ 洪为法 《曲阜漫话》，《为法小品集》，第13页。

和自己的姐姐在一起放风筝、跑竹马。^①即使在祭孔大典这种非常严肃的场合，偶尔也会流露孩子气，“在丁祭时，这位小圣人是主祭，峨冠博带，巍巍的笔立在大成殿前一群人中间，动也不能一动。仪节既很隆重，他的态度也不能不很庄严。他到大成殿去献爵时，有红纱灯，玻璃灯，香炉引着，两手提着腰间玉带，一步三摇，真是斯文极了，大约这事很痛苦，他站久了，也向一旁看看，露出幼稚的笑容。只是随时左右陪祭的都向他投射一股可怕的目光，他惟有受他们征服，又敛了笑纹，不敢邪视”^②。

与游人见面时，孔德成一般并不多言，“衍圣公他毕竟还是一个小孩子，所以他没有多大的话会讲，只是我们问他几句，他便照直的回答我们几句”^③。多数情况下，都由其陪同人员代为回答。从他们的一问一答中，可以窥见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信息。譬如衍圣公的教育问题、衍圣公府的经济问题。^④

频繁的接待让尚未及舞勺之年的孔德成不堪其扰，有时候还颇感无奈。倪锡英曾在游记中记载，他们去拜见衍圣公时，衍圣公刚刚陪国民党人张继和日本政要犬养毅吃完饭。可与他们的座谈开始十几分钟后，衍圣公突然说肚子饿了，要去吃饭，于是这次会面匆匆结束。倪锡英当时颇为疑惑，为什么刚刚吃过饭的衍圣公会感到饥饿，以为这是送客的一种方式。可从孔德懋的回忆中可以得知，其实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因为“每次贵宾来访，小弟都要被领去接见客人，又要学一套繁琐礼节。在宴请贵宾时，要设‘高摆酒席’，摆出孔府的‘高摆餐具’，上菜一百三十多道。但出于礼仪，小弟吃得很少，常在客人刚走就嚷着饿，立即给他重新开饭”^⑤。由此可知，衍圣公其实也有许多不为外人所知的苦衷。

① 孔德懋《孔府内宅轶事——孔子后裔的回忆》，第38页。

② 洪为法《曲阜漫话》，《为法小品集》，第14~15页。

③ 倪锡英《曲阜泰安游记·曲阜之部》，第47~48页。

④ 汤之盘《曲阜游记》，《人文月刊》第1期，1944年。“衍圣公多数时间在家读书，孔府请了四五位先生，教他读老夫子的四书五经。除接受传统教育外，他还经常去明德中学接受新式教育，专门去读英文算术等，衍圣公一度还有出国留学的打算，但后来又放弃了这种想法。”这一情况，可在孔德懋的回忆录中得到证实。参见孔德懋《孔府内宅轶事——孔子后裔的回忆》，第88~92页。

⑤ 孔德懋《孔府内宅轶事——孔子后裔的回忆》，第144页。

四 落后的社会经济

交通闭塞的地方，经济自然很落后。一些细心的游人，在去曲阜城的路上，通过观察已经隐约感觉到了这一点。“乘人力车约行十三四里，车夫方停下来茶棚休息。他们吃西瓜，我们也买了一个，价七分钱。对面就是瓜田，我们走过去看，那里满地都是打过子儿用的老西瓜，瓜肉酸涩不能入口。可是这时却有五六个孩子，光着身子捧着西瓜啃，我们因气味熏人欲呕，掩了鼻走回茶棚。这本地人生活可见很苦吧。一会儿车子仍行田垌中，近年山东年成不坏，豆子高粱都好。只是田里男妇老幼，做着工的，胳膊都瘦得像麻秸，不见一些壮实筋肉。大约乡人食物营养太不够了。女的仍裹着小脚。”^①

曲阜社会经济的落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公共设施的缺失，二是日常生活的开支非常低廉。

从公共设施来说，“那时是1930年的秋天，这里只有第二师范安装了一架小发电机，发全校用的电，县政府、孔府和民间连电灯还没有”^②。曲阜的街道本就狭窄，由于缺乏公共卫生观念和保洁制度，整个城里黑泥遍地，“北道上原是黄沙出产地，而曲阜的街上，则不是黄沙，却是黑泥。街心是垃圾场，任何人任何时候都可公然的将垃圾向街心一倒，腥骚烂臭，来往行人，都得分尝其滋味”^③。

当时的曲阜，虽然不断有游人前来，但当地人显然还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赚钱的机会，所以，各种服务设施多不尽如人意，住宿吃饭等服务设施少得可怜。游人抵达曲阜，首先要住宿，可当时城里并没有像样的旅馆。“我们本想今夜在曲阜城里找个旅馆住，可是自从进了南门，一直没有见到一块旅馆的招牌。没有法子想，只得同那位菜馆主人去商量。据他说‘城里只有客店，是很简单而且陋小的。要找大些的旅馆，除非要回到姚村！姚村就是曲阜车站——那里有很大的铁路宾馆，中西旅馆等。’”^④

① 凌叔华 《泰安曲阜记游》，《国闻周报》第11卷第41期，1934年。

② 陶钝 《一个知识分子的自述》，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第228页。

③ 洪为法 《曲阜漫话》，《为法小品集》，第8页。

④ 倪锡英 《曲阜泰安游记·曲阜之部》，第26页。

车站的旅馆，也多不令人满意，“几家旅馆都是茅屋矮檐，藜床土炕，此外别无新式旅馆。车站旁有一个津浦宾馆的门亭，里面的房舍都给北伐之役的炮火所毁了”^①。这种状况，让不少外地的游客深感意外，“我们很愿意立刻就找到一个旅馆，或是一个饭馆……但是这又是一件难事，那个曲阜城里，真是滑稽得很。什么中正街，南门大街，在书上面尽管说得怎么样好，可是我们看见的，只是泥土的路，草盖的屋，没有很大的店铺，没有整齐的房屋，更没有旅馆饭馆”^②。有游客好不容易在城外找到落脚之处，却又有诸多意想不到的麻烦。“我们住在曲阜南关的一个小店里，可是因为吃饭问题，每天总得进城两三趟，因为那店只能睡觉，是不卖饭的，甚至于有时候喝碗白开水也得进城，否则那只好不吃不喝。”^③

住宿的条件不好，吃饭的条件更差。曲阜城里虽有餐馆，但其卫生条件常让游客望而却步。“这是已经午后一点多，车夫说他们带我们到街上一家大酒馆去。吃过中饭，再去孔林也不迟。我们由他们带到一家饭馆前停下来。进门便是炉灶，做成的荤菜素菜摆了一案板，苍蝇黑漆漆扑来扑去。铺伙很恭敬的把我们让进雅座内，原来只有一间小房，叫我们点菜。我们想到方才的苍蝇，什么菜都不想吃，只要了三碗热汤面，伙计很失望的答应了。到民间去，饮食倒也是一大问题呢。”^④

由于经济不发达，生活开支自然有限。在曲阜任教的学校教员作为当地社会的上层群体，对此深有感触。“教员的伙食每月八元钱，八个人一桌。早上稀饭馒头；中午、晚上两餐，每桌八器菜，其中有一个大件。这大件是鸡、鸭、鱼（南旺湖的鲤鱼）、肘子，每餐至少有一件。我们说，不要吃得这样好。厨师傅回答说，这么吃，八元钱还花不完呢！再减菜，他那个厨子没办法了。”即使是在曲阜二师求学的学生，在日常生活中也颇感宽裕，“学生的生活，公家每月补贴五元，这是师范学校的公例。师范大学这五元，每人每月的伙食是不够的。在曲阜二师，学生自己管伙食，吃的是白面馒头，大油炒菜，每周至少吃一次炖肉，过节还可以吃一顿曲阜特产——当年上贡用的香稻米做的米饭（产地在曲阜县东南部）。这样只能用四元钱，剩一元

① 汤之盘 《曲阜游记》，《人文月刊》第1期，1944年。

② 倪锡英 《曲阜泰安游记·曲阜之部》，第25页。

③ 孟粹夫 《曲阜记游》，《中学生文艺季刊》第1卷第1期，1935年。

④ 凌叔华 《泰安曲阜记游》，《国闻周报》第11卷第41期，1934年。

钱积起来可以买书，添衣服”^①。直至抗战时期，曲阜城的生活开支仍然很低廉，“在当时北平面粉每斤卖到一元左右的时候，那里才刚刚的五毛钱，尤其是鸡子、牛肉比米面还要便宜，而且来源也特别畅旺，牛肉每斤只卖四毛钱，鸡子平均每元钱可以买到八九个，还是顶新鲜顶大的个，所以那时候，我们的营养特别好，平均每天一斤牛肉，十个鸡子”^②。这种状况持续了多年，与曲阜虽为城市，实质更农村化息息相关。^③

因为经济落后、教育不发达，曲阜的社会风气依然保留着浓厚的传统底色。“古代封建残余的势力，在曲阜依然保留着，很容易地就可以见到。一般人称孔庙为圣庙，称孔子后裔衍圣公所住的地方为圣公府——也简称圣府。街上轻易看不见一个年轻的女郎走过。甚至连女学生也很少。大约她们还都在深闺里关着吧。这的确是一个封建势力浸透了的一个古城；更何况孔庙里一到初一、十五两日，便来一个祭祀的大典。这封建的仪式，每月还重温它几次呢。”^④ 受此影响，对于外来游人带来的新鲜事物，曲阜本地人多用一种异样的眼光去审视。“外地人偶尔到曲阜来观瞻观瞻，女人著了高跟鞋，街上人可以獐头鼠目的看，鬼鬼祟祟的谈。‘奶奶！脚上带了钩子！’高跟鞋，在一班人认为是带了钩子，可谓形容入微。而开口便是‘奶奶’，实含有无限的轻蔑侮辱之意。”^⑤

早在20年代，有游人到曲阜一游后便大发感慨，认为“曲阜交通机关太笨重，亟宜改良；曲阜风气闭塞，男垂辫，女裹足，甚于济南；曲阜风俗敦朴，诚实不欺，然其蔽也陋”^⑥。这种状况，直至30年代时依然如故。

五 结语

20世纪30年代初的曲阜，并未因孔子与儒家思想饱受批评而被国人

① 陶钝 《一个知识分子的自述》，第228~229页。

② 宇明 《怀曲阜》，《中国晨钟》第10期，1946年。

③ 这种状况，在新中国成立后依然长期延续。至20世纪80年代，山东高校流行这样一句顺口溜“山大的牌子，山师的院，山医的大门，曲师的菜。”曲师（即曲阜师大）的菜之所以出名，主要原因即是物美价廉。

④ 王洪涛 《曲阜的踪迹》，《青年月刊》第3卷第5期，1937年。

⑤ 洪为法 《曲阜漫话》，《为法小品集》，第57页。

⑥ 韦润珊 《曲阜记游》，《史地学报》第2期，1923年。

遗忘。而且，从游记中可以看出，一些游人对孔子本人及其贡献仍持肯定的态度，“二千多年来，孔子支配了整个的中华民族的思想。在目前观点上，不论毁之的如何，誉之的又如何，而我们得承认此后的将来，孔子仍必将操纵着我们整个民族的灵魂。因为到现在为止，还只有他的学说平易、中和，他使你在日常起居举止之间，受到他的影响。他的思想渗透到社会或个人的最细微之处，最深邃的地方。当你感受到他的影响之时，或许你本身还不曾觉到。不相信，事实在这儿”^①。

孔子及儒家思想的影响仍在，但曲阜城并未因此而繁荣兴旺，在许多游人眼里，曲阜城成为古老与落后的象征。“我在这儿匆匆的停了几天，对于这地方的一切当然没有深切的了解和认识。但它却给我一个总括的感觉那就是‘古老’二字。到处古色古香的庙宇、松林，固然是‘古老’的表现，就是遍街石臼、石碾又何尝不古呢？人民说话钝钝的声音及迂缓的动作，都保有古老民族的风度。尤其是夜初闭城门的时候，更表出一种深沉的古风。每到闭门时我就听见这样的大喊三声‘呵……关城门哩呵！’声音沉郁而粗钝。我一听到这喊声，心里便感到像在沙漠内生活样的寂寞。”^②特别是曲阜城那浓郁的乡村风味，给各地游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曲阜，以后我一想到它，就联想到他的这些古迹。孔庙、孔林，足以代表曲阜的一切。它除去能使我们见到这些古迹之外，还能给我们什么呢？说句实在话，它给我的只是沉闷，忧郁。它的零落的街市，萧条的商业；无论如何，也不能给我一个好的印象。它十足表现着它是一个带着乡间境味的一个城市。”^③

曲阜之所以被视为乡村化的城市，与现代进步和进化观念的传播息息相关。近代以降，随着西潮东渐，儒家思想在欧风美雨的冲击下节节败退，以至于殃及孔子本人。究其主因，首在器物层面无法抗衡西方。受此刺激，洋务运动、戊戌维新与辛亥革命相继开展，试图通过器物革新与制度革新，阻止中国堕入殖民地的深渊。民国建立，一度给人以希望，可袁世凯的复辟及民主政治的混乱，又促使一部分知识分子将矛头指向孔子及儒家思想。特别是在进化思潮与唯物史观的影响下，进步、革新的观念日

① 凌松寿《曲阜访孔子故里》，《旅行杂志》第21卷第7期，1947年。

② 孟粹夫《曲阜记游》，《中学生文艺季刊》第1卷第1期，1935年。

③ 王洪涛《曲阜的踪迹》，《青年月刊》第3卷第5期，1937年。

益流行，至20世纪30年代更是成为时代主流。在进化进步思潮普遍被国人接受的情况下，城市代表着进步，乡村意味着落后，保留着浓郁乡村气息且为孔子故里的曲阜，自然成为古老与落后的象征。尽管国民政府提倡尊孔，但显然无法掩饰儒家思想不擅长物质建设的这一缺陷。“回去兖州的路上，我闭目坐在车里，细想孔子的教义，想一想论语的句子（我只背过一部论语），我总觉得中国人生活得太苦，孔子帮不了什么忙。况且他做了几千年帝王的清客，此刻忽然要他老人家脱去宽袍大帽，穿上套轻便的二十世纪服装，只凭这一点来说，未免使这好好先生太难为情了。”^①或许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多数游人尽管对孔子仍抱有敬意，但对其后裔及儒家思想则已失去旧式读书人的尊重与温情，拜见已经失去政治特权的衍圣公就像参观博物馆的陈列品一样，更多地将其视为一种过去的文化符号。

作者：吕厚轩，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① 凌叔华 《泰山曲阜记游》，《国闻周报》第11卷第41期，1934年。

nese society. In this way , we will find out the motivation and limitation of the thought and behavior from the west i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and help us better grasp the pattern of China's modern soci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Modern China; The Anti - Prostitution; the Foreign Settlement of Shanghai; Christian Community; China's Modernization

Male Suicide in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Change: Taking Modern Qingdao as an Example
Jing Fei fei / 267

Abstract: In modern times , with the continuous changes of social and economic situation in Qingdao , under the construction of traditional gender division , male as the main force of subsistence , the ability to maintain family life gradually reduced , increasing economic pressure , leading to rising male suicide rate.

Key Words: Social Change; Male Suicide; Modern Qingdao

“Rural City”: Tourists' View of Qufu in the Early 1930s

Lü Houxuan / 286

Abstract: China's tourist industry saw its primary development in the early 1930s , when social order along the Tientsin - Pukou railway was quite stable. Qufu , as a historic city , became a highly recommended tourist destination. A larger amount of tourists visited Qufu with a sense of respect for Confucius as well as a sense of curiosity for his descendants. Yet most tourists were a little bit disappointed at this “rural city” , featuring limited transportation , sparse scenic spots , bad economy , and old - fashioned social customs. Although tourists may agree with the importance of Confucius as well as his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 they may not realize the tender feeling and respect for Confucius as old Chinese intellectuals. This shows that back then , affected by the trend of progress and innovation , Confucius and his descendants only existed as a cultural symbol , instead of a kind of faith that can guide action.

Key Words: In the 1930s; Tourists; Qufu “Rural City”